

从进贡到私易：10—11世纪于阗玉的 东渐敦煌与中原

荣新江¹ 朱丽双²

(1. 北京大学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 北京 100871)

中文摘要: 利用史籍和文书的有关记载, 论述10—11世纪于阗玉输入敦煌和中原的情况。我们看到, 由于10世纪初于阗王国和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建立了姻亲关系, 两地之间遂有正常且频繁的官方往来, 于阗并通过沙州和中原王朝建立起联系, 此后于阗玉被大量地东运敦煌并入贡中原, 同时也输送到其他丝路王国, 如甘州回鹘、西州回鹘, 成为这些丝路王国或地方政权向东方贸易的“特产”之一。于阗玉进入中原, 早期以朝贡为主, 后周时, 官禁放开, 民间贸易随之兴起。到了宋代, 于阗玉石的官私贸易持续不断, 即使在于阗从佛教王国转变为伊斯兰世界以后仍然如此。

关键词: 于阗; 玉; 敦煌; 皇帝玺印

中图分类号: G256.1; K2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06(2014)03-0190-11

DOI: 10.13584/j.cnki.issn1000-4106.2014.03.026

From Tribute to Trade: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the Jades of Khotan into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RONG Xinjiang¹ ZHU Lishuang²

(1. Center for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2. 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Chinese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Abstract: Based on historical records and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this paper presents a study on the Khotan jades into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in the 10th and 11th centuries. As known generally, in the early 10th century, there was a marriag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uling families of Khotan and the Return-to Allegiance Army Regime (*Guiyijun*) at Dunhuang, thus starting the official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areas. Khotan was also able to establish official relations with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via Dunhuang, leading to

收稿日期: 2014-03-2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与于阗: 佛教艺术与物质文化的交互影响”(项目编号: 13&ZD087)

作者简介: 荣新江(1960—), 男, 天津市人, 北京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主要从事隋唐史、中外关系史、西域中亚史、敦煌吐鲁番学等研究。

朱丽双(1972—), 女, 浙江省平阳县人, 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图书馆员, 主要从事古代于阗及其和唐朝、吐蕃的关系以及西藏近代史研究。

continuous eastward dissemination of the jades of Khotan into Dunhuang and the Central Plains as well as into the other kingdoms along the Silk Road such as the Ganzhou Uighur and the Qocho Uighur. As a result, Khotan jades became one of the “specialities” in the trade between these Silk Road kingdoms and the Central Plains’ dynasties. At first, the jades were brought to the Central Plains as a royal tribute and later were used for nonofficial trade during the Later Zhou period (951–960). In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both official and nonofficial trade of Khotan jades continued, even after the Buddhist kingdom of Khotan was converted to Islamism.

Keywords: Khotan; Jade; Dunhuang; Imperial seal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于阗玉石的东渐敦煌

于阗盛产美玉，玉石或加工成品的玉器一直是于阗对外交往中的主要输出品，于阗与敦煌的关系密切，输往敦煌的于阗玉当不在少数，只是我们在现存资料中能看到的直接记录并不多。然而，敦煌藏经洞文书保存的记录为世人留下了极其珍贵的资料，我们就其中比较典型的例子略作探讨。

S. 4359 敦煌曲子《谒金门·开于阗》唱道：“开于阗，绵绫家家总满。奉戏(献)生龙及玉碗，将来百姓看。”^[1]据考，这里唱诵的是公元 901 年归义军打通前往于阗道路之事^[2]。在敦煌人看来，打开和于阗交往通道的好处是于阗的绵绫、良马及美玉将源源不断而来。

事实的确如此。当于阗王国的使者前往敦煌或者经过敦煌前往中原王朝朝贡的时候，玉是他们随身携带的最重要的朝贡贸易产品。P. 2958 写本保存有若干封于阗语书信草稿，应是公元 10 世纪下半叶于阗使者前往中原经过敦煌时留下的，其中第 6 封信(第 199—215 行)是一位名叫 Hva Pa-kyau 的“朔方王子”上给于阗朝廷的书状，其中提到，一位于阗使者 Hvāṃ Capastaka(也是于阗王子之一)根据于阗朝廷的指令，用 30 斤玉从沙州归义军官府那里换取了 200 匹丝绸(śaca)。另外在第 7 封(第 216—227 行)书信中，朔方王子希望其母后能多给他一些玉石，以便换取更多丝绸^[3]。这里我们看到了丝绸之路最常见的一种贸易交换，就是用于阗的玉石与敦煌的丝绸做交换，各取所需。

P. 5538 正面是于阗语文书《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罗(Visa' Śūra)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尉迟苏罗王(967—977 年在位)在信中提到

于阗王国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944—974 年执政)的礼物是：

一是中等玉石一团，重四十二斤；二是纯玉石一团，重十斤；三是玉石一团，重八斤半；总计玉石三团，六十斤半。^[4]

据下引羽 686 文书，于阗的玉团至少分为“大玉”和“玉”两种，大玉一团至少重 80 斤，普通的玉一团在 20 斤以下。P. 5538 于阗文文书又为我们提供了“中等玉石”的重量，也就是一团在 42 斤上下，这正好介于羽 686 文书所记“大玉”和“玉”的重量之间，可以让我们看出于阗玉石据大小而分为三种的情况。

近年来，日本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所藏敦煌写本陆续公诸于世，其中有许多重要的文书，特别引人瞩目的是 2013 年首次发表的羽 686 号文书^[5]。该写本的前部下端有今人收藏印，文曰“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此系李盛铎藏书印，然此卷是否李盛铎旧藏，无法确定。我们在获得杏雨书屋寄来的《敦煌秘笈》后即对文书上的文字和印鉴做了释读，后来收到赤木崇敏氏的大作《10 世纪于阗的王统·年号问题的新史料——敦煌秘笈羽 686 文书》^[6]，因为其中的关键文字及相关的关键人物的考订与我们有所不同，所以值得略加

关于 P. 2958 书信的年代，参考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相关问题》，《于阗史丛考》(增订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第 76 页。

关于李盛铎藏卷或冒称李盛铎藏敦煌写本上的印鉴问题，参看荣新江《李盛铎写卷的真与伪》，《敦煌学辑刊》1997 年第 2 期，第 1-18 页；收入作者《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其英文本参见“The Li Shengduo Collection: Original or Forged Manuscripts?” *Dunhuang Manuscript Forgeries* (The British Library Studies in Conservation Science 3), 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 pp. 62-83, pl. 1.

详细地声明我们的看法。先将我们释录的文字掲載于下：

- 1 皇帝赐 舅元忠
- 2 东河大玉壹团,重捌拾斤。
- 3 又昆岗山玉壹团,重贰拾斤。
- 4 又东河玉壹团,重柒斤。
- 5 又师子大玉鞞轡壹副。
- 6 又密排玉鞞轡壹副。
- 7 骠马壹匹。 乌马壹匹。
驢马壹匹。
- 8 鍔叁錠,共拾陆斤半。
- 9 □□□□□已遣,此不及
(后缺)

文书原文上钤有三方朱印,分别在第1行“舅元忠”上,第7、8行最后“壹匹”、“斤半”处,第9行最后“此不及”上,应当都是关键词的位置。印文清晰,文曰:“书诏新铸之印”。这一印鉴又见于P.5538于阗文《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罗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上,共九枚^{[4][23]},文字完全相同,表明是尉迟苏罗王所用之印,年代在970年前后,或许就是他967—977年在位期间所用之印。

第一行的“舅”字,是理解本文书的关键字。赤木氏读作“男”。此字初看上去,的确像是一个“男”字,因为上面没有“臼”,似为“男”字。但对于此字我们的看法是,这里的“田”左侧不封口,与下引P.2826中的“男”字不同,或许是“舅”字的俗体。我们之所以这样释读,更重要的原因是这里的“元忠”肯定就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他从944—974年一直执掌沙州政权,晚期号称大王。与他同时代的于阗王是李圣天(Viśa' Saṃbhava,912—966年在位)和尉迟苏罗,因为李圣天娶曹元忠姊为后,所以曹元忠不能是其“舅”,更不能是其“男”。而曹元忠恰好是尉迟苏罗的舅舅,把羽686文书上的皇帝看作于阗王尉迟苏罗,则与曹元忠的关系正好吻合,也和P.5538于阗文《天尊四年(970)于阗王尉迟苏罗致沙州大王曹元忠书》中前者称后者为舅正相符合,两件文书上的印鉴也完全相同。

赤木氏的读法本自他对于阗王统世系的一贯看法,这一看法是建立在吉田丰的一个假说基础上的。吉田氏认为P.4091于阗语文书上的年代“kha,yai-gvī,nā(开运)二年”与P.t.44藏文文书

所记某王的“二年,虎年[十二月]”都是指966年,这个“开运”可能是李圣天娶曹议金女之前的妻子所生的某位短命于阗王在965—967年之间所用的年号,因为天寿年号最晚纪年是三年六月,所以他推测开运在965年年中开始。此外,他还假设此前的天寿年号只有963—965年,也可能是另一位短命的于阗王所用的年号^[7]。赤木氏接受这一假说,曾把P.2826书写的发信人于阗王看作是吉田氏假设的李圣天的另一儿子,而收信人“沙州节度使男令公”指曹元忠,并因此推测曹元忠曾娶这位于阗王之女为妻^[8-9]。对于羽686号文书,赤木氏再次把上面的于阗王看作是尉迟苏罗王之外李圣天的另一儿子,曹元忠是他的女婿,因此称之为“男”。

对于赤木氏的看法,只能说是立足于推测之上的推测,上面已经证明其所依据的推测是难以成立的。即便这种推测成立,试想曹元忠本是李圣天的内弟,他如果娶李圣天之子的女儿为妻,则是自降了两个辈分,虽然我们说胡人(如果把曹家视作粟特人的话)不重行辈,但曹氏到了曹元忠的时期,已经完全标榜为汉人,归义军节度使恐怕很难接受这样的婚姻。况且,我们在丰富的敦煌石窟供养人榜题和敦煌文书的记载中,完全看不到这样一位“曹元忠之妻”。反之,我们看到李圣天之后的尉迟苏罗王,一直称曹元忠为舅。也就是说,曹元忠与于阗王李圣天的兄弟关系,与尉迟苏罗的舅甥关系是毫无疑问的,中间很难出现一反常态的于阗王与曹元忠的岳丈与女婿的关系。再者,羽686文书使用的是“书诏新铸之印”,而P.2826书信上是“通天万寿之印”和“大于阗汉天子制印”,两者不似为同一个于阗王所用。因此,我们认为赤木氏关于羽686文书上人物关系的解说是难以让人接受的。

我们相信,羽686文书正是于阗国皇帝尉迟苏罗致舅曹元忠的一封信,因为是出自胡人手笔的汉文文书,所以直呼其舅元忠之名,这看似有点

印鉴的清晰图版见H. W. Bailey ed., *Saka Documents*, II, London: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1, pl. 38. 参看赤木氏上引文所附图版IV刊出的两方印文对照的彩色图版。

此据荣新江、广中智之译《有关和田出土8-9世纪于阗语世俗文书的札记》(二),《西域文史》第3辑,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7-98页。

不可理喻,但 P.5538 也同样用了一个不该使用的大“敕”字,这些表明,尉迟苏罗朝廷中书状起草者的汉文化水平仍有待进步。

明确了这件书状的发信人和接受者的身份后,文书的内容就益显珍贵了,它记录了于阗国皇帝赠送给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礼品清单。其中包括出自于阗东河(Yurung kash,玉龙喀什河)的重 80 斤的大玉一团,出自昆岗山的重 20 斤的玉一团,出自东河的重 7 斤的玉一团,还有用玉制作的鞦韆两副,以及三匹不同的马和镔铁三锭。这是一份相当丰厚的礼物,要较 970 年于阗王尉迟苏罗为求沙州派兵增援于阗抵抗疏勒黑韩王朝而送的礼品更为厚重,或许说明这封信的年份要晚于 970 年,比于阗王有求于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事情更加紧急和重要。

另外一件涉及于阗致送敦煌玉石的材料,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 P.2826《于阗王致沙州令公书》,其文字如下:

白玉壹团

赐沙州节度使男令公,汝宜收领,勿怪轻鲜,候大般次,别有信物汝知。其木匠杨君子千万发遣西来,所要不惜(惜)也。凡书信去,请看二印,一大玉印,一小玉印,更无别印也。(上钤大印文曰:通天万寿之印;小印文曰:大于阗汉天子敕印)

我们已于别处论证过这里的人物关系,应当是于阗尉迟达磨王(Viśa' Dharma,978—982 年在位)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976—1002 年执政)的书信,年代在 984—1002 年之间^[10]。这封信没有说这块送给沙州官府的玉石有多重,估计不是很大,所以于阗王颇有歉意,但他答应下次有更大的使团去沙州时,将带给归义军节度使更好的礼物。他急切地希望敦煌方面把一位杨君子派到于阗,真是所要不惜,表明于阗对敦煌技术工人的需求之迫切。

由以上几件文书可见,由于于阗、敦煌两地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姻亲关系,于阗王国把相当数量的上好玉石赠送给敦煌官府。有些玉石的送出,是有其特定目的的,如换取技术工匠、获得相当数额的丝绸、争取军事援助等,在已经遗失的文献中,应当还有更多的内涵。

二 于阗玉石的入贡中原

于阗致送玉石给敦煌的另外一个目的,是想在敦煌官府的帮助下,直接与中原王朝建立联系。我们知道在 934 年李圣天娶曹议金(914—935 年执政)之女为皇后之后,随即打开了通往中原之路,玉石也随之由于阗王国的使臣,直接带到中原。938 年第一批到达中原后晋王朝的于阗使马继荣一行,就携带者着玉团和玉制品,当然还有其他西域土特产:

[天福三年]九月,于阗国王李圣文(天)遣使马继荣进玉团、白氍毹布、牦牛尾、红盐、郁金、碇(碇)砂、大鹏砂、玉装鞦韆、鞦韆鞦韆、手刃(刀)。^[11]

后晋皇帝对于从遥远西域而来的于阗使臣给予了积极响应,随即派遣供奉官张匡邺等出使于阗,册封李圣天为“大宝于阗国王”^[12]。待张匡邺等还,李圣天又遣都督刘再昇至晋,“献玉千斤及玉印、降魔杵等”^{[12]919}。如此重量的玉石,至少包含十块以上的大玉,可见这是于阗国王李圣天感谢受封大宝于阗王而进贡的重礼。

960 年,宋代周而立,于阗很快就遣使前往宋朝通好,其敲门砖仍然是玉器。《宋会要辑稿》记太祖建隆二年(961)十二月四日,“于阗国王李圣文(天)遣使贡玉圭一,盛以玉匣。”^[13]《宋史》卷 490《外国传》“于阗”条记同一件事云:“建隆二年十二月,圣天遣使贡圭一,以玉为柙(匣);玉枕一。”^[14]一为礼器,一为保健用品;一属于公务,一表示私谊,用心良苦。

《宋会要辑稿》又记乾德三年(965)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于阗王及瓜沙州皆遣使来朝,贡马、橐驼、玉、琥珀。”^{[13] 7841}据《宋史》卷 2《太祖本纪》载,这次进贡的数目极大,“甘州回鹘可汗、于阗国王等遣使来朝,进马千匹、橐驼五百头、玉五百团、琥珀五百斤”^[15]。其中五百团的玉多半应当来自于阗。

比较特别的一次是在开宝二年(969),于阗国遣使直末山至宋廷,“言本国有玉一块,凡二百三十七斤,愿以上进,乞遣使取之。〔于阗僧〕善名复至,贡阿魏子,赐号昭化大师,因令还取玉”^{[14]14107}。按:969 年在位的于阗王是尉迟苏罗,为什么他不让使臣直接带这块巨玉到宋进贡,而希望宋朝派

使者去取呢？我们推测他是有意仿效其父李圣天故事，希望宋朝会以取玉之便，像晋朝那样派使者对他进行册封。宋朝没有后晋的怀远之意，只是让再次来朝的于阗僧人善名去把玉取来。

史籍没有记载善名是否把这块大玉送到宋廷，不过于阗僧人的确在玉石东渐上做出了很多贡献。山东兖州兴隆塔地宫发现的舍利塔铭文称，于阗僧法藏于开宝三年(970)去西天取经，获得“释迦形像、世尊金顶骨真身舍利、菩提树叶”，后来入宋，圆寂于中原，嘉祐八年(1063)龙兴寺众僧将舍利安葬。碑文说到法藏进奉给宋朝“白玉叁佰玖拾斤、细马叁匹”^[16]，如此数目的进奉，说明他不是个寻常人物，或许和于阗王室有什么关系，其时于阗与疏勒战事方酣，他入贡这么多的白玉、细马，也许是被于阗王派来寻找战争支援的，但碑文没有明言缘故，这里仅是推测。

另外，于阗语文书 Or.8212/186+P.2786、IOL Khot S.13(Ch.00269.23-108)也言及于阗使前往中原进献玉石及其他物品之事。他们的报告说，由于河西道路不靖，甘州情形混乱，他们无法顺利前往^[17-18]。而且从前件文书来看，于阗使中似包括僧人和私商。由于一方面文书残破不全，另一方面文书的年代不明，我们无法得窥具体情况，故此处从略。

宋朝对于阗美玉似情有独钟，张世南《游宦纪闻》言：“国朝礼器及乘舆服御，多是于阗玉。”^[19]《宋史》卷122《礼志》：“安陵中玉圭、剑佩、玉宝等，皆用于阗玉。”^[20]

宋朝既如此需要于阗玉，那么坐等人家来进献似乎不够用。《宋史》卷490《外国传》“回鹘”条载：“太平兴国二年(977)冬，遣殿直张璨赍诏谕甘、沙州回鹘可汗外甥，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以备车骑琮璜之用。”^{[14]14114}正如殷晴所论，甘、沙不产美玉，两地输往宋朝的玉石当来自于阗^[21]。所谓“赐以器币，招致名马美玉”，实际就是一种贸易。

宋人对于阗玉的追求，一直没有间断，这种对玉的追求，并未因于阗佛教王国的灭亡而终止，继续统治于阗的喀喇汗王朝仍然以于阗国的名义，提供玉石。《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记：

天圣三年(1025)十二月，〔于阗国黑韩王〕遣使罗面于多、副使金三、监使安多、都监赵多来朝，贡玉鞍辔、白玉带、胡

锦、独峰橐驼、乳香、硃砂。诏给还其直，馆于都亭西驿，别赐裘衣、金带、银器百两、衣着二百，罗面于多金带。^{[14]14108}

熙宁(1068—1077)以来，远不逾一二岁，近则岁再至。所贡珠玉、珊瑚、翡翠、象牙、乳香、木香、琥珀、花蕊布、硃砂、龙盐、西锦、玉鞦韆马、膃肭脐、金星石、水银、安息鸡舌香，有所持无表章，每赐以晕锦旋襴衣、金带、器币，宰相则盘球云锦夹襴。^{[14]14108}

于阗至宋的使者或一两年来一次，或一年来一两次，而且多“有所持无表章”者，也就是私商，可见当时宋朝和于阗之间官私贸易的兴盛情形。虽然这里所说是于阗佛国灭亡以后的事，但是这种兴盛情形当是以此前的玉石贸易作为基础的。

《宋史·外国传》“于阗”条还记载了一则宋人求取于阗玉的传奇故事：

初，太平兴国中(976—984)，有澶州卒王贵者，昼忽见使者至营，急召贵偕行，南至河桥，驛马已具，即命乘之，俄觉腾虚而去。顷之驻马，但见屋室宏丽，使者引贵入，见其主者容卫制度悉如王者。谓贵曰：“俟汝年五十八，当往于阗国北通圣山取一异宝以奉皇帝，宜深志之。”遂复乘马凌虚而旋。军中失贵已数日矣，验所乘，即营卒之马也。知州宋煦劝贵以闻，太宗释之。天禧初(1017)，贵自陈年已五十八，愿遵前戒，西至于阗，寻许其行。贵至秦州，以道远悔惧，俄于市中遇一道士引贵出城，登高原，问贵所欲，具以实对。即命贵闭目，少顷令开，视山川顿异，道士曰：“此于阗国北境通圣山也。”复引贵观一池，池中有仙童，出一物授之，谓曰：“持此奉皇帝。”又令瞑目，俄顷复至秦州，向之道士已失所在，发其物，乃玉印也，文曰：“国王赵万永宝”，州以献。^{[14]14107-14108}

这一倾向可能从后周开始，史载显德六年(959)二月，回鹘遣使至周廷，“献玉并硃(硃)砂等物，皆不纳，所入马量给价钱。时世宗以玉虽称宝，无益国用，故因而却之。”见《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回鹘”条，中华书局，1976年，第1843页。

又见《宋会要辑稿》“蕃夷七历代朝贡”条，第7837页，据补括号中字。

这则故事表明了宋朝皇帝对于阆玉是多么的渴望,因为代表皇权的玺印需要用于阆玉来制作,所以关系重大。

宋人笔记中还有大观(1107—1110)、政和(1111—1118)年间添创御玺用于阆玉的几则记录,虽然年代稍晚,但很能说明问题,故不厌其烦地征引如下。

蔡绦《铁围山丛谈》卷1:

天子之制六玺。元丰间(1078—1085)得玉矣,行制而未就。至大观时(1107—1110)始成之,然但缪篆也。又元符初(1098)得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又一文曰〕(据《学海》本补):“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是二者,祐陵又自仿为之,悉鱼虫篆也。号传国玺曰“受命宝”,九字玺曰“镇国宝”,合天子之制六玺,是为八宝。乃于大观戊子(1108)正月元会日受之,因大赦天下。本朝礼乐,于此百五十年矣,至是始备。及后,政和末(1118),又新作一玺。上曰:“八宝者,国家之神器。今再创玺,乃我受命者也。”因诏于阆国上美玉焉。久而得之,为玺九寸,而鱼虫篆。其文曰:“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诏号“定命宝”。是岁戊戌(1118)元会,于大庆殿受之。

太上始意作定命宝也,乃诏于阆国上美玉。一日,绦赴朝请,在殿阁侍班,王内相安中因言,近于阆国上表,命译者释之,将为答诏,其表大有欢也。同班诸公喜,皆迫询曰:“甚愿闻之。”王内相因诵曰:“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中,條贯主,阿舅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條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那玉,自家煞是用心。只被难得似你那尺寸底。我已令人寻讨,如是得似你那尺寸底,我便送去也。”于是一坐为哈。吾因曰:“《裕陵实录》已载于阆国表文,大略同此。特文胜者,疑经史官手润色故尔。”众乃默然。其后,遂以玉来上,长径二尺,色逾截肪,诚昔未有也,遂制定命宝。岁余,玉人始告成,精巧视古无别矣。宝与检皆大九

寸,盘螭为纽,鱼虫篆文,凡十有六字。于是定命宝合八宝,通号九宝,下诏以为乾元用九之义云。^[22]

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

大观(1107—1110)中,添创八宝,从于阆国求大玉。一日,忽有国使奉表至。故事,下学士院,召译表语,而后答诏。其表云:“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條贯主,师子黑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條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时要者玉,自家甚是用心力,只为难得似你尺寸底。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才得似你尺寸底,便奉上也。”当时传以为笑。后果得之,厚大踰二尺,色如截肪,昔未始有也。^{[19/46 [23]]}

因为于阆国的上表文字过于浅显,所以成为从北宋到南宋士人们的笑柄,但这些记载提供给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宋朝在添制皇帝的玺印时,需要到于阆求取大玉。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何谓“大玉”,也就是80斤左右的一块整玉,于阆虽然盛产美玉,但于阆黑韩王需要派人在东西两条玉河寻访,最后才得到需要的尺寸。于阆玉的到来,使宋朝的“定命宝”之玺得以告成。

三 经过沙州归义军的玉石朝贡贸易

于阆玉石向中原输送,更多的可能是通过中间绿洲王国或政权的中转。而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地方政权向中原的朝贡实际上都有回赐,从而构成一种特殊的官方贸易形式。乾符五年(878),归义军曾入唐朝进奉。P.3547是沙州进奏院上归义军节度使的状文,其中记录了河西道贺正专使押衙阴信君等一行,带着表函一封、玉一团、羚羊角一角、牦牛尾一角,到唐朝都城长安进贡,并为节

引文中的标点据己意与点校本略有不同。拙稿其他引文也同此,不一注明。

按,以上两处引文中的“條(條)贯主”,或认为是 tabghač / tabghač 的回译音写,在当时是喀喇汗王朝境内讲突厥语的诸民族对中国的称呼,后世译作“桃花石”。《铁围山丛谈》点校本将“條贯主”点断,似误。见黄时鉴《“條贯主”考》,《远迹心契——中外文化交流史》(《黄时鉴文集》II),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11-15页。黄先生并认为,若从对音考虑條(t'au)比條(d'ieu)更加贴切。

度使求节。唐朝对使团“军将长行等各赐分物锦彩银器衣等”，还给在沙州的节度使等官员“恩赐答恩及寄信分物等”，又“赐贺正专使阴信均(君)等上下廿九人驼马价绢每人各卅三匹三丈三尺六寸”^[24]。正如学者所说，所谓朝贡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朝廷的回赐一般均相当丰厚^[25-27]。在归义军的进贡物品中，有“玉一团”，虽然不多，但排在首位，说明于阗玉石十分珍贵。我们不知道当时玉、绢的比价究竟如何，但是可以肯定，中原朝廷的回赐一定大大地多于地方政权的进贡，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屡屡在史料中见到中原朝廷限制地方政权进贡次数和使团人数的记载。

归义军与于阗建立正式联系后，玉石便成为敦煌进贡中原王朝的主要“方物”。比如P.4638《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曹仁贵(曹议金)状》：

玉壹团，重壹斤壹两；羚羊角伍对；硃砂伍斤。

伏以碛西遐塞，戎境枯荒；地不产珍，献无奇玩。前物等并是殊方所出，透狼山远届敦煌；异域通仪，涉瀚海来还沙府。辄将陈献，用表轻怀。干黷鸿私，伏乞检纳。谨状。

权知归义军节度兵马留后守沙州长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上柱国曹仁贵状上。^{[24]387}

状文特意说玉石等不是敦煌所产，乃是殊方所出，来自异域。其中的玉就是来自于阗。

归义军节度使与周边政权交往时，玉常常也是重要的礼物。P.2992V-3《长兴二年(931)六月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致甘州顺化可汗书》：

季夏极热，伏惟弟顺化可汗尊体动止万福。即日兄大王蒙恩，不审近日尊体何似。伏惟顺时，倍加保重，远诚可(所)望。已前西头所有世界事宜，每有般次去日，累曾申陈，计应上达。自去年兄大王当便亲到甘州，所有社稷久远之事，共弟天子面对商议平稳已讫，兄大王当便发遣一伴般次入京。昨五月初，其天使以(与)沙州本道使平善达到甘州，弟天子遣突律依都督往沙州通报衷私，无意之人，稍有些些言语。天使以(与)本道使蒙赐馆驿看待，兼改头并不

减损，允过西来。昨六月十二日，使臣以(与)当道使平善到府，兼赍持衣赐分(信)物，并加兄大王官号者，皆是弟顺化可汗天子惠施周备。圣泽曲临，以(与)弟天子同增欢庆。今遣内亲从都头价荣实等谢贺，轻信上好燕脂、表(镶)玉(境)壹团重捌斤、白绵绫伍匹、安西继两匹、立机细继拾捌匹、官布陆拾匹，己(以)前物等，到垂检容。更有怀，并在贾都头口申陈子细。谨状。^{[24]395-396[28]}

史籍中有关归义军节度使送给中原王朝的玉石或玉器的记载不少，这些玉石多半来自于阗，玉器或可能是用于阗玉石在敦煌加工而成^{[21]42}，以下我们把重要的史料罗列出来：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四月〕，沙州曹义(议)[金]进玉三团、硃(硃)砂、羚羊角、波斯锦、茸褐、白氍、牛黄、金星矾等。^{[11]11253}

〔同光四年正月〕，沙州节度使曹义全(议金)进谢赐旌节官诰玉鞍马二、玉团、硃(硃)砂、散玉鞍辔、铰具、安西白氍、胡锦、雄黄、波斯国红地松树毛褐、梧桐泪、金星举(矾)、大鸳鸯。^[29]

〔后唐同光四年〕二月，沙州曹义全(议金)进和市马百匹、羚羊角、硃(硃)砂、牦牛尾。又进皇后白玉符、金青符、白玉狮子指环、金刚杵。^[29]

〔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十二月〕，沙州曹义(议)金进马四百匹、玉一团。^{[11]11255}

〔后唐长兴三年正月〕，沙州进马七十五匹、玉三十六团。^{[11]11255}

〔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沙州曹继贤子延禄遣使入宋贡玉盆、宝毡。^{[13]7844}

〔宋太平兴国五年三月〕，〔曹〕延禄遣使裴溢的名似四人来贡玉圭、玉盆、玉挝、波斯宝毡、安西细毡、茸褐、斜褐、毛罗、金兴(星)矾等。^{[30]7767}

〔宋〕咸平二年(999)二月，〔曹延禄〕遣人进贡玉团、马二匹。^{[13]7846[30]7767}

〔宋〕景德元年(1004)四月，〔曹〕宗寿遣使，以良玉、名马来贡。^{[30]7767-7768[31]}

〔宋景德〕四年五月，〔曹〕宗寿遣瓜沙州节度上司孔目官阴会迁等三十五人诣阙贡玉团、玉印、乳香、硃(硃)砂、薰驼、名马，诏赐锦袍、金带、器币，酬其值。^{〔30〕7768}

〔宋〕天圣元年(1023)闰九月，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遣使翟来著等贡方物、乳香、硃(硃)砂、玉团等。^{〔30〕7768〔13〕7836〔14〕14124}

〔宋〕皇祐二年(1050)四月，沙州符骨笃未似娑温等来贡玉。^{〔30〕7768}

〔辽统和二十四年(1006)八月〕，沙州敦煌王曹〔宗〕寿遣使进大食国马及美玉，以对衣、银器等物赐之。^{〔32-33〕}

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一些，我们不一一罗列。吴丽娱曾作“归义军时期进贡品”一表，读者可参阅^{〔27〕817-820}。

四 经过甘州回鹘的玉石朝贡贸易

甘州回鹘的情况与沙州大略相仿。史籍中保存的甘州回鹘向五代、北宋时期中原政权进贡的材料更加丰富多彩：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四月，回鹘都督李引释迦、副使田铁林、都监杨福安等六十六人陈方物，称本国权知可汗仁美在甘州差贡善马九匹、白玉一团。^{〔11〕11253〔34〕〔12〕916}

〔同年十一月〕，回鹘都督安千想进玉团、驼马等。^{〔11〕11253}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二月，回鹘顺化可汗仁裕遣使翟未思等三十人进马八十匹、玉一团。^{〔11〕11255〔34〕}

〔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使献故可汗仁裕遗留贡物：鞍马、器械。仁美献马二、团玉、鞞辔、硃(硃)砂、羚羊角、波斯宝缙、玉带。^{〔11〕11256}

〔后唐清泰二年(935)〕七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陈福海而下七十八人，献马三百六十匹、玉二十团、白氍毹、斜褐、牦牛尾、绿野马皮、野驼峰。^{〔11〕11256}

〔后晋高祖天福〕三年(938)三月，回鹘可汗仁美进野马、独峰驼、玉辔头、大鹏砂、硃(硃)砂、膍肭脐、金刚钻、羚羊

角、白貂鼠皮、安西丝、白氍布、牦牛尾、野驼峰等物。^{〔11〕11256〔35〕}

〔后晋天福〕四年三月，回鹘都督拽里敦来朝，可汗仁美贡镂剑琇玉、良马百匹、瑶祛、宝辔、舟盐、麝氍、玉狻猊、白貂鼠、牦牛之尾、駟駟之革。^{〔11〕11256}

〔后晋天福〕五年正月，回鹘可汗仁美遣都督石海金来朝，贡良马百匹，白玉百团，谢册命也。^{〔11〕11256〔34〕1843}

〔后晋少帝以天福七年七月即位，十一月〕，回鹘托都督已下进硃(硃)砂千八百斤、牦牛尾一千斤、白布一万匹、斜褐一百段、玉梳、玉装刀子等物。^{〔29〕1883}

〔后晋〕天福七年，回鹘都督来朝，献马三百匹、玉百团、玉带一。^{〔11〕11257}

〔后晋〕开运二年(945)二月，回鹘可汗进玉团、狮子玉鞍、硃(硃)砂、红盐、野驼峰、安西白氍、膍肭脐、大鹏砂、羚羊角、牦牛尾、貂鼠等物。^{〔11〕11257}

〔后〕汉隐帝乾祐元年(948)五月，回鹘可汗遣使入贡，献马一百二十匹，玉鞍辔、玉团七十三，白氍百二十七，貂鼠皮二百二十六，牦牛尾一百四十八，玉鞞鞞三百三十四，又羚羊角、硃(硃)砂、诸药。^{〔11〕11257}

〔后周广顺二年(952)〕三月，回鹘遣使每与难支、使副骨迪历等十二人来朝，贡玉团三、珊瑚树二十、琥珀五十斤、貂鼠皮、毛褐、白氍毹、皮靴等。^{〔11〕11257}

〔后周广顺〕三年正月，回鹘入朝使独呈相温氍毹段七百七十、玉团一、珊瑚片七十。^{〔11〕11257}

〔宋〕乾德二年(964)正月，遣使赵党誓等四十七人来贡玉百团、牛尾一株、白牦牛尾六十株、貂鼠皮百一十张、玉珠子五百三十五颗、碎玉百二十五段、玉蹠蹠子百一十事、马六十五、驼十九。^{〔36〕7714〔14〕14114}

〔宋乾德〕三年四月，遣使张都督来贡马十、七十、玉七团、琥珀二百二十九斤、硃(硃)砂四囊、牦牛尾四十株、毛

按《旧五代史》卷138《外国列传》“回鹘”条记此次回鹘的贡品还有“白玉鞍辔等”。(第1843页)

褐五十段、白氍布三十段、白石二块、玉鞍辔一副、貂鼠皮五十张。^{[36]7714}

〔宋乾德三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可汗遣使孙夜落与沙州、瓜州同入贡马千匹、驼五百、玉五百余团、琥珀五百斤、碯(硃)砂四十斤、珊瑚八枝、毛褐千匹、玉带、玉鞍等。^{[36]7714}

〔宋太平兴国〕五年(980)闰三月二十六日，甘、沙州回鹘遣使裴溢的名似等来贡橐驼、名马、珊瑚、琥珀、良玉。^{[13]7844}

〔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四月，回鹘安密贡玉带。^{[36]7716}

〔宋大中祥符五年五月〕十四日，甘州使安进献玉一团、马三匹。^{[36]7716}

〔宋大中祥符〕九年十二月，甘州回鹘夜落隔归化及宝物公主、宰相索温守贵等，遣使都督翟福等来贡马及玉、香药。^{[36]7717[13]7850}

〔宋天圣〕三年(1025)三月十三日，甘州可汗来贡乳香、碯砂、琥珀、白玉、马。^{[13]7851}

〔宋天圣〕六年二月十五日，甘州可汗王宝国夜落隔遣使副都督贡玉、琥珀、乳香。^{[13]7851}

还有一件与我们讨论的主题相关的是敦煌藏文文书 P. t. 984B，这是一件吐蕃统治结束之后的藏文文书^[37]，开头作 rje'i zha snga nas“王之尊前”。“王”似指于阗王^[38]，发信人不明。文书言及发信人从这位王那里收到的礼品，包括 chab shel(玉石?)五六驮、黄金百两、汉地丝绸织物(men tri rgya dags)百匹(?)以及玉鞍(shel sga)、玉碗(shel gyi zhal bu)和其他宝碗等。这份礼单相当贵重，收受这份礼品的人必定极为尊贵，或许是甘州回鹘可汗? 礼品中有大量 chab shel。《翻译名义大集》有 chu shel 一词，汉译作“水晶”。按 chu 意为“水”，chab 是“水”的敬语，但是若说 chab shel 和 chu shel 一样指“水晶”，似乎不确。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于阗出产水晶的记载，就是和于阗往来密切的甘、沙二州呈献给中原朝廷的礼品中也从未见水晶，倒是经常言及玉石。所以我们这里暂将 chab shel 译作“玉石”。

在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甘州回鹘盘踞河西通往中原的道路要冲，且有意把持和中原的朝贡贸

易，另外仲云、龙家等部落也经常劫掠来往的朝贡使团，河西道路充满凶险。这种情形在同光二、三年间(924—925)曹议金征服甘州回鹘之后有所改善，特别是长兴元年(930)曹议金亲访甘州，和甘州顺化可汗建立起比较友好的兄弟关系，此后数年，沙州使者可以常往中原而不受阻隔^{[28]325-329}。曹议金去世之后，甘、沙关系时好时坏，但总体上讲保持着正常的往来。再者，沙州归义军和于阗方面也经常给甘州回鹘可汗赠送贵重礼品，因此得以借道而顺利前往中原。有时候我们还可以见到甘、沙、于阗同时进贡的记载。与于阗的进奉物以玉为主不同的是，甘、沙二州的进奉物包括多种河西和西域的土特产品，如羚羊角、碯砂等，不过美玉和良马一起，常常名列贡品的首位^{[27]816-821}。

五 经过西州回鹘的玉石朝贡贸易

西州回鹘方面的材料不多，但却有很详细的一条记录，即《册府元龟》卷 972《外臣部·朝贡五》记：

〔后〕周太祖广顺元年(951)二月，西州回鹘遣都督来朝，贡玉大小六团、一团碧琥珀九斤、白氍布一千三百二十九段、白褐二百八十段、珊瑚六树、白貂鼠皮二千六百三十二、黑貂鼠皮二百五十、青貂鼠皮五百三、旧貂鼠袄子四、白玉环子、碧玉环子各一、铁镜二、玉带较具六十九、玉带一、诸香药称是。回鹘遣使摩尼贡玉团七十七、白氍段三百五十、青及黑貂鼠皮共二十八、玉带、玉鞍辔较具各一副、牦牛尾四百二十四、大琥珀二十颗、红盐三百斤、胡桐泪三百九十斤，余药物在数外。^{[11]11257}

《旧五代史》卷 138《回鹘传》有同一事情的记录，但补充了内容：

周广顺元年二月，〔回鹘〕遣使并摩尼贡玉团七十有七，白氍、貂皮、牦牛尾、药物等。先是，晋、汉以来，回鹘每至京师，禁民以私市易，其所有宝货皆鬻之入官，民间市易者罪之。至是，周太祖命除去旧法，每回鹘来者，听私下交易，官中不得禁诘，由是玉之价直十损七八。^{[34]1843}

前人已经指出，广顺元年的回鹘使团，是西州回鹘首次向五代中原王朝进贡的队伍，其贡品

质之优、数量之大,都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看到,其中不论是回鹘可汗的贡品,还是在西州回鹘势力极强的摩尼教大法师的礼物,都以玉石为首,还包括一些玉器制品。《旧五代史》还提到,此前回鹘进贡物品,是禁止百姓与来使私下交易的。但从此时开禁,民间也可以自由买卖,于是玉石的价格大幅度下降。虽然如此,进入宋朝后,于阗玉石和玉制品仍不断进入中原,对此前文已经谈及,此处不再赘述。更多例证,可参阅《宋史》卷490《外国传》“回鹘”条的相关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宋朝显然延续了后周“听私下交易”的做法,而且不只对回鹘,对其他地方政权和绿洲王国可能也一样,从而使得更多的于阗玉进入东方。但在另一方面,朝廷却出现了缺乏良玉的情形。史载元丰七年(1084)七月,宋神宗诏令熙河路帅臣李宪:“朝廷奉祀所用珪、璧、璋、璜,常患乏良玉充用。近岁于阗等国虽有贡者,然品色低下,无异恶石。尔可博选汉、蕃旧善于贾贩,与诸蕃踪迹谙熟者,厚许酬直,令广行收市,并达是意于阿里骨等处,求之无害。”^[39]可能彼时于阗美玉大多流入私商之手,所以宋廷只能寻找那些善于贾贩并与诸蕃谙熟的汉蕃人士,厚给他们酬直,令他们广行采购^[40]。这条记载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于阗玉私下交易的活跃。

六 小 结

殷晴先生曾经指出:“汉唐期间,玉石只是贡献给中原皇室及王公大臣,作为礼器和极少数人的装饰用品,严禁民间买卖。唐末五代才逐渐在市场出现,至公元10世纪也就是宋朝建立前后,于阗玉石则已成为贵重商品在丝路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并为于阗增加经贸收入的特种资源。”10世纪于阗玉石的大量进入市场,“作为丝路贸易的特殊商品,增添了这段历史的瑰丽色彩。”^{[21][39]}这个看法很有见地。更进一步讲,晚唐时期由于于阗与敦煌还没有建立官方关系,虽然民间不会中断玉石贸易,但是贸易的数量恐怕有限。自10世纪初叶于阗王国与归义军政权之间有了正常且频繁的官方往来以后,于阗玉被大量运至敦煌,同时也运送到其他丝路王国,如甘州回鹘、西州回鹘,成为这些丝路王国或地方政权向东方贸易的“特产”之一。进入宋代以后,于阗玉石的官私贸易持续不

断,即使是在于阗从佛教王国转变为伊斯兰世界以后仍然如此。史籍和文书中有关敦煌、甘州、西州诸政权之间以及他们向中原王朝入贡玉石的记录,充分说明了在当时丝绸之路的朝贡贸易中,玉石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 [1]饶宗颐.敦煌曲[M].巴黎:法国远东学院,1971:237.
- [2]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M]//于阗史丛考.增订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5-86.
- [3]H.W.Bailey.Altun Khan[J].*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1967,30(1):97-98.
- [4]H.W.Bailey.Śrī Viśā Śūra and Ta-urang [J].*Aisa Major, new series*,1964,11(1):19.
- [5]吉川忠夫.敦煌秘笈:影片册:第9册[M].大阪:武田科学振兴财团,2013:65.
- [6]赤木崇敏.10世纪コータンの王统・年号問題の新史料:敦煌秘笈羽686文书[J].*内陸アジア言語の研究*,2013,28:101-128.
- [7]吉田丰.コータン出土8-9世紀のコータン語世俗文書に関する覚え書き[M].神戸:神戸市外国語大学外国学研究所,2006:76-78.
- [8]Takatoshi Akagi.Six 10th Century Royal Seals of the Khotan Kingdom [M]//Y.Imaeda, M. T.Kapstein, T.Takeuchi.*New Studies of the Old Tibetan Documents: Philology, History and Religion* (Old Tibetan Documents Online Monograph Series vol.III). Tokyo: Research Institute for Languages and Cultures of Asia and Africa, 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2011: 218-221.
- [9]Takatoshi Akagi.The Genealogy of the Military Commanders of the Guiyijun from Cao Family[M]//Irina Popova, Liu Yi.*Dunhuang Studies: Prospects and Problems for the Coming Second Century of Research*.St.Petersburg:Slavia,2012:9-10.

如:“咸平四年(1001),可汗王禄胜遣使曹万通以玉勒名马、独峰无峰羸驼、鍔铁剑甲、琉璃器来贡。”(第14115页)“[大中祥符三年(1010)],龟兹国王可汗遣使李延福、副使安福、监使翟进来进香药、花蕊布、名马、独峰驼、大尾羊、玉鞍勒、琥珀、瑜石等。”(第14116页)“[大中祥符]六年,龟兹进奉使李延庆等三十六人对于长春殿,献名马、弓箭、鞍勒、团玉、香药等,优诏答之。”(第14116页)

- [10]荣新江,朱丽双.一组反映10世纪于阗与敦煌关系的藏文文书研究[G]//沈卫荣.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5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108.
- [11]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972[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256.
- [12]欧阳修.新五代史:卷74[M].北京:中华书局,1974:917.
- [13]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9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7840.
- [14]脱脱,等.宋史:卷490[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106.
- [15]脱脱,等.宋史:卷2[M].北京:中华书局,1977:23.
- [16]谭世宝.兖州兴隆塔地宫宋嘉祐八年十月六日“安葬舍利”碑考释[C]//兴隆文化论坛:兖州佛教历史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兖州,2009:251.
- [17]P.O.Skjærø. *Khotanese Manuscripts from Chinese Turkestan in the British Library. A Complete Catalogue with Texts and Translations* [M].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2:55-60, 509-513, 520.
- [18]See also H.W. Bailey. *The Seven Princes* [J]. *Bulletin of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48, 12(3/4): 616-624.
- [19]张世南.游宦纪闻:卷5[M].张茂鹏,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46.
- [20]脱脱,等.宋史:卷122[M].北京:中华书局,1977:2848.
- [21]殷晴.唐宋之际西域南道的复兴:于阗玉石贸易的热潮[J].西域研究,2006(1):42.
- [22]蔡绦.铁围山丛谈[M].冯惠民,沈锡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7:8-9,22.
- [23]周辉.清波杂志校注[M].刘永翔,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250.
- [24]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367-369.
- [25]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商业贸易市场研究[J].敦煌学辑刊,2004(1):107-109.
- [26]Valerie Hansen. *The Tribute Trade with Khotan in List of Materials found at the Dunhuang Library Cave* [G]//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2005) new series, 19* (Iranian and Zoroastrian Studies in Honor of Profs Oktor Skjaerø). 2009:40.
- [27]吴丽娱.试述敦煌书信书状中的礼物与礼单:以官场酬应和敦煌归义军的送礼活动为中心[C]//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10:821.
- [28]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328-329.
- [29]王钦若,等.册府元龟:卷169[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878.
- [30]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8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7767.
- [31]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56[M].北京:中华书局,1980:1235.
- [32]脱脱,等.辽史:卷14[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2.
- [33]脱脱,等.辽史:卷70[M].北京:中华书局,1974:1149.
- [34]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138[M].北京:中华书局,1976:1842.
- [35]薛居正,等.旧五代史:卷77[M].北京:中华书局,1976:1014.
- [36]徐松.宋会要辑稿:第197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7:7700.
- [37]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书:第9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333.
- [38]T. Takeuchi. *Sociolinguistic Implications of the Use of Tibetan in East Turkestan from the End of Tibetan Domination through the Tangut Period (9th-12th c.)* [G]// D. Durkin Meisterernst, S. Raschmann, et al. *Turfan Re-visited: The First Century of Research into the Arts and Cultures of the Silk Road*. Berli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2004:341.
- [39]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47[M].北京:中华书局,1990:8320.
- [40]任树民.北宋时期的于阗[J].西域研究,1997(1):28.